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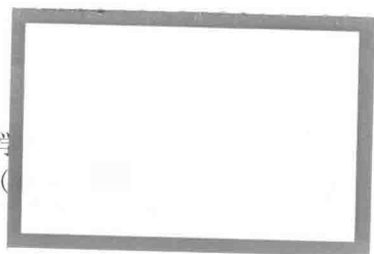
诗经臆说

SHIJING YISHUO

刘树胜 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金陵科技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重点学
金陵科技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资金资助



诗经臆说

SHIJING YISHUO

刘树胜 著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臆说 / 刘树胜著. -- 保定 : 河北大学出版社,

2013.12

ISBN 978-7-5666-0537-5

I. ①诗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《诗经》- 诗歌研究

IV. ①I207.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0411号

责任编辑: 梁志林

装帧设计: 王占梅

责任印制: 靳云飞

出版: 河北大学出版社 (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1 / 16 (710mm × 1000mm)

字数: 272千字

印张: 18

版次: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12月第1次

书号: ISBN 978-7-5666-0537-5

定价: 38.00元

序 言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最早的经典著作之一。两千多年来的研究，成果累累，蔚为大观。正因为它是“经典”，内涵极为丰富，经久耐读，发人深思，所以论者的解读，见仁见智，常说常新，余味无穷。今天我们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本着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的原则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用新的思维、视角和方法，对《诗经》各篇作品的本来面目，特别是它的诗学本质、意义和艺术成就，从不同角度、用不同方法进行分析和评论，是一件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，希望有人出来担此重任。当然，论者各有所长，选择自己之所长来研究《诗经》，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，从而取得货真价实的成果。这种期望，果然在眼前出现了。

近来拜读了刘树胜教授撰写的《〈诗经〉臆说》书稿，引人注目，耐人回味。作者既能继承《诗经》经学研究的一些优良传统，又能突破《诗经》经学研究的固有藩篱，而以自己的思维方式、独特的视角和较为擅长的方法，对《国风》中一些争议较大的作品，有选择地加以解析，有理有据，新意迭出，让人读后，另眼看待。

更值得可圈可点的是：作者对所论作品，力求做到爬梳抉剔，去疵存瑜。引用旁证材料，能择善而从，令人信服。训诂精确到位，考证辨析，以实证为断，入情入理，具有说服力。在行文过程中，能将义理与阐释有

读经臆说

机结合，又能将历史观感和现代观感打通关系，合理对接，巧运神思，进行深度分析，层层递进，逻辑严密，灿然一新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作者既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，又有独到的见解和现代眼光。由此让我确信，作者如果不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，是无法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好书，值得推荐。我想，此书问世后，读者读后定会 有所启迪和收获的。

以上就是我的读后感。

近因身体欠佳，只能要言不烦，长话短说，难免挂一漏万，若有不妥之处，祈望谅解。

八十老翁 殷光熹

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日

书于昆明白龙书屋

目 录

序言 / 1

历代《诗经》误读原因臆说 / 1

睢鸠的特性与恼人的情思

——《周南·关雎》臆说 / 16

装不满的顷筐与浇不尽的情愁

——《周南·卷耳》臆说 / 22

藤缠树与幸福指数

——《周南·樛木》臆说 / 29

螽斯与多子多孙的民族心理

——《周南·螽斯》臆说 / 36

夭夭的桃树与灼灼的桃花

——《周南·桃夭》臆说 / 42

芣苢的价值与采摘母题

——《周南·芣苢》臆说 / 50

失意的追求与男人的胸怀

——《周南·汉广》臆说 / 57

诗经臆说

麒麟与人丁兴旺

——《周南·麟之趾》臆说 / 64

鹊巢鸠占与第三者插足

——《召南·鹊巢》臆说 / 70

涌动的草虫与驿动的青春

——《召南·草虫》臆说 / 76

召伯甘棠与百姓拥戴

——《召南·甘棠》臆说 / 83

落梅对吉士的表白

——《召南·摽有梅》臆说 / 92

小星与小吏的命运

——《召南·小星》臆说 / 99

吉士·玉女·龙吠

——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臆说 / 108

百年孤独与《离骚》的前奏

——《邶风·柏舟》臆说 / 116

绿衣·古人·悼亡之祖

——《邶风·绿衣》臆说 / 123

劳燕分飞与万古送别之祖

——《邶风·燕燕》臆说 / 131

坏小子·无眠·打喷嚏

——《邶风·终风》臆说 / 138

棘对凯风的忏悔

——《邶风·凯风》臆说 / 146

髧彼两髦的后生与不谅人的母亲

——《邶风·柏舟》臆说 / 156

考槃在涧与不愿示人的快乐

——《卫风·考槃》臆说 / 162

说“兄弟啜笑”

——《卫风·氓》臆说 / 172

思念与一切为了爱

——《卫风·伯兮》臆说 / 180

仲子跳墙与寓劝于讽

——《郑风·将仲子》臆说 / 188

三哥的德艺与求偶的标准

——《郑风·叔于田》臆说 / 199

蹕河赴约与打情骂俏

——《郑风·褰裳》臆说 / 208

风雨鸡鸣赋深情

——《郑风·风雨》臆说 / 216

一论“郑声淫”

——回到朱熹的时代去 / 224

再论“郑声淫”

——回到孔子的时代去 / 233

硕鼠的胃口与百姓的忍耐度

——《魏风·硕鼠》臆说 / 239

人生苦短·居安思危·及时行乐

——《唐风·蟋蟀》与《唐风·山有枢》臆说 / 252

洁身自好与自怜自爱

——《曹风·蜉蝣》臆说 / 260

征人的牵挂与家园的恍惚

——《豳风·东山》臆说 / 267

写在后面 / 275

历代《诗经》误读原因臆说

传统《诗经》学力倡“诗无达诂”和“见仁见智”，这似乎给笼罩在《诗经》身上的千层迷障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——原本不同时代、不同思想、不同出身、不同经历、不同识见的读者或研究者，对同一首诗的内容的理解就应该是各不相同的。

而历代的《诗经》研究史就是一部《诗经》的解读史，几千年的研究成果足可以排成一条文化的长城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纷繁复杂、难辨其详的解释？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脱离文本的误读呢？这恐怕要涉及到历史的、文化的、思维方式的等等诸多的因素。下面就个人的理解，对《诗经》误读的原因做初步探讨。

一、“陈诗讽谏”是《诗经》误读的始作俑者

所谓“陈诗”，也就是拿出自己的诗作，而不是把别人的诗作拿出来引用一番，这在《诗经》的编辑诸说中又被称为“献诗说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邵公谏厉王曰：

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

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⁽¹⁾

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，“陈诗讽谏”不仅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，也是《诗经》编辑成书的一条渠道，也可以说是《诗经》的一种创作意图。作为一种政治制度，它自然带有行政命令的性质，所以说话时也就难免有一定的忌讳，就不一定很直白。这样，后人在读到原本意在讽谏的那些诗的时候，就只好去猜测了；作为一条搜集、整理、编辑《诗经》的渠道，在它们从地方到中央逐层上传的过程中，这些主观上作为讽谏的诗，在意义层面上也会由各级官员对此做着修改，它的初始意义也会发生改变；作为一种创作意图，作者也会在诗里把想要表述的意思欲吐还藏地露出一一点圭角，这种创作意图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读诗解诗的方法。这就造成了后世读者在对诗本义把握上的困难。

“陈诗讽谏”的制度，似乎从根本上也决定了《诗经》的象喻性质，致使后人主观上认为《诗经》的全部诗篇都是在绕着弯儿地向政治靠拢。明显讽喻的自不待言，即使是那些反映爱情婚姻的、反映劳动生活的，甚至是反映一般民俗风情的作品，也莫不带上政治的印记。比如《关雎》，从内容上无论怎么看都是一首爱情诗，但到了《毛传》那里就成了“后妃之德”，是后妃“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”，意思是文王的老伴儿看上了一个淑女，她要把这个女子引荐给文王，而其深层的意蕴是借引见女子来表达对贤人的思慕。看来，有了一个政治标准，所有的诗都要自觉地绑定到它上面去，这无疑是一个笑话！皮锡瑞《经学概论·诗经·论风人多托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》里有引朱熹的一段话：“君举解诗，凡诗中所说男女事，不是说男女，皆是说君臣，未可如此一律。今人解经，先执偏见，类如此。”⁽²⁾指摘的应该也是“陈诗讽谏”的弊端。其实，《诗经》的编辑渠道并非仅此一种，而“陈诗讽谏”也不过是一种约束公卿列士思想的政治制度，况且用诗歌进行讽谏也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，所以，仅用政治眼光来看待《诗经》的所有篇什，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。

在历代的《诗经》著述中，这种论调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。《毛诗

序》首开其端，他把这种功能概括为“主文而谏”：

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⁽³⁾

朱熹把它解释为“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”，也就是用幽隐的言辞而不直言过失。显然，这种看法还是从《诗经》“陈诗讽谏”的创作意图出发的。风诗的创作目的是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是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”；而变风、变雅的创作目的是“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”。这样看来，整部《诗经》从根本上就成了一种下层百姓和各级官员干预国政的谏书了。比如《东山》，原本就是一道征夫思乡的诗作，恪守“陈诗讽谏”的《毛传》却说：“《东山》，周公东征也。周公东征，三年而归，劳归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诗也。”⁽³⁾既是“劳归士，大夫美之”，诗里为何还要出现“我东曰归，我心西悲”那样的话？为何还要出现“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”那样的景？很明显，这种基于“陈诗讽谏”的解释是捉襟见肘的。

“陈诗讽谏”并不是一味地讽刺和劝谏，它还包括一定的颂美主题，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美刺传统。

二、“赋诗见志”的风气，造成了断章取义的语言习惯，影响了对《诗经》的正确解读

所谓“赋诗”的“赋”，不是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本纪》里所说的“登高必赋”的“赋”，而是一种非创作状态的“赋诗”，也就是吟诵前人或他人的创作；而“见志”则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思想。“赋诗见志”连起来讲，就是用现成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观点。这不是一种作诗的方法。

法，而是一种用诗的方法，严格来讲就是一种语言习惯，类似于引用或引证。

在现存的、《诗经》成书之前的文献里，反映“赋诗见志”风气的典籍主要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等。而《礼记》和《孝经》的著作年代尚有争议，且其引诗目的只是著作者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进行的印证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除去确为《诗》成书之前的经典外，最能说明“赋诗见志”这一现象。通过对这两部史书的阅读，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“赋诗见志”这一语言方式的特点，并由此寻绎出后世《诗经》所以被误读的蛛丝马迹。

所谓“赋诗”，指的是吟诵整篇的诗。这种方式取决于这首诗与说话人要表述的思想或情感的一致程度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把这种一致性称作“合意”：

诗所以合意，歌所以咏诗也。今诗以合意，歌以咏之，度于法矣。⁽¹⁾

意谓借赋诗以明志，通过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来传递赋诗者本人想要传达的信息。

从现存的史料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“赋诗”大多是外交场合往来斡旋过程中的话语方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说：“古者，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谕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’也。”⁽⁴⁾ 昭公十六年，到郑国聘问的晋国正卿韩宣子回国时，郑国的六卿为他饯行。韩宣子为了解郑国人的志向，请他们各赋一诗。这应该是《左传》中记载的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赋诗活动。

夏四月，郑六卿饯宣子于郊。宣子曰：“二三君子请皆赋，起亦以知郑志。”

子羔赋《野有蔓草》。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！吾有望矣。”子产赋郑之《羔裘》。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。”子大叔赋《褰裳》。宣子

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于他人乎？”子大叔拜。宣子曰：“善哉，子之言是！不有是事，其能终乎？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蔣兮》。宣子喜曰：“郑其庶乎！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，赋不出郑志，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，数世之主也，可以无惧矣。”宣子皆献马焉，而赋《我将》。子产拜，使五卿皆拜，曰：“吾子靖乱，敢不拜德？”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，曰：“子命起舍夫玉，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，敢不藉手以拜？”

公至自晋。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：“晋之公室，其将遂卑矣。君幼弱，六卿强而奢傲，将因是以习，习实为常，能无卑乎？”⁽⁵⁾

像这样于严肃的外交场合赋情诗以喻君子之交或邦国相好，不但运用得巧妙，而且在春秋时代属于比较常见的情形。但这些诗有两个共同特点：一是均为赋诗者本土之“郑风”，二是均为男女相互羡慕、赞美、追求、热恋的爱情诗。这两个特点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，这些诗就是男人作的；这些爱情诗不是真正的爱情诗，而是象征性很强的政治抒情诗。所以，我们经常看到类似把《将仲子》说成是讽刺祭仲的那样的解释。

而“赋诗见志”这一话语方式的主观目的就是“见志”，它所使用的特定政治场合，又决定了这个“志”决非诗作本意，而是拔高了的、为话语双方认同的个人之“志”或政治意图，如上举郑国的例子；或承诺认同，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申包胥如秦请兵，秦哀公为赋《无衣》：

及昭王在随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曰：“吴为封豕长蛇，以荐食上国，虐始于边楚。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曰：‘夷德无厌，若邻于君，疆场之患也。逮吴之未定，君其取分焉。若楚之遂亡，君之土也。若以君灵抚之。世以事君。’”秦伯使辞焉，曰：“寡人闻命矣。子姑就馆，将图而告。”对曰：“寡君越在草莽，未获所伏，下臣何敢即安？”立，依于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七日。秦哀公为之赋《无衣》。九顿首而坐。秦师乃出。⁽⁵⁾

或嘲笑讥讽，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齐庆封如鲁聘问，叔孙豹赋《相鼠》讥讽他“无仪”、“无止”、“无礼”：

齐庆封来聘，其车美。孟孙谓叔孙曰：“庆季之车，不亦美乎？”叔孙曰：“豹闻之：‘服美不称，必以恶终。’美车何为？”叔孙与庆封食，不敬。为赋《相鼠》，亦不知也。卫宁喜专，公患之。公孙免余请杀之。公曰：“微宁子不及此，吾与之言矣。事未可知，只成恶名，止也。”对曰：“臣杀之，君勿与知。”⁽⁵⁾

倘若使诗作具备这种全新的“志”，就必须进行精心的“误读”。

“赋诗见志”是怎样造成了对《诗经》的误读的呢？从上述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首先，《诗经》本身具备“言志”的特质，而这种“志”道出的又往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基型，因而极易使人产生共鸣。《尚书·尧典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⁽⁶⁾《毛诗序》曰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⁽⁶⁾在“赋诗言志”的过程中，《诗经》言志言情的特点被引、赋诗者和听者充分地认识并加以发挥，从而起到一种沟通两者情感和认识的桥梁作用，最终达到“明志”的目的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载，郑简公在垂陇设享礼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时，伯有赋《鄘风·鹑之奔奔》，赵文子从中窥见了伯有影射郑简公的意图，预见了伯有的下场：

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二子石从。赵孟曰：“七子从君，以宠武也。请皆赋以卒君貺，武亦以观七子之志。”子展赋《草虫》，赵孟曰：“善哉！民之主也。抑武也不足以当之。”伯有赋《鹑之奔奔》，赵孟曰：“床第之言不逾阂，况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闻也。”⁽⁵⁾

而这种断章取义又牵强附会的“融汇”，必然导致对《诗经》作品原意的错误认知；其次，“赋诗见志”多用于外交场合，往往带有委婉的政治目

的，象喻的成分很多；而所赋诗作的内容又往往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背景相似，容易使人产生二而一的错觉。如申包胥哭秦庭，秦穆公赋《无衣》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例。看一看《毛诗序·秦风·无衣》的小传，自然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委；第三，断章取义是造成后世《诗经》误读的最根本原因。“‘断章取义’是赋诗的惯例，赋诗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诗的人的心意。”⁽⁷⁾无论是“引诗”还是“赋诗”，共同的方法都是“断章取义”，说话人从不顾及作品的内容和原意，主观上截取诗中的部分诗句，或截取整首诗里与说话背景近似的某一方面的意思，用于自己的话语当中。可以想见，这样的理解与原作主题产生距离是可想而知的，造成对《诗经》的误读也是必然的。

正是由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等历史典籍里记载的大量引诗、赋诗现象，给后代的《诗经》研究者造成了一种错觉，把那些引诗赋诗的史实当作了《诗经》的本事，从而导致了作品的误读。

三、先秦儒家的诗教，将《诗经》与政治教化联姻，《诗经》的主旨人为偏移

孔子是把《诗经》与政治教化融合在一起的始作俑者。孔子办学设德行、政事、言语、文学四科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教授弟子，培养弟子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个方面的才能，而作为诗教教科书的《诗经》就成了他教育弟子的必修课程。

孔子对《诗经》的所有认识，都是基于《诗经》思想内容的“思无邪”，为其有高尚的、不偏颇、不下作的内容，它才具有了拿来教育人、感化人的用途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⁽⁸⁾今天看来，“无邪”的思想标准也是比较宽泛的，虽然他曾经放言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家邦者”，说过“郑声淫，放郑声”那样的狠话，但他还是允许了《郑风》的存在，承认了它的“无邪”。这是从人性终极关怀的角度肯定了《诗经》的教化性质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孔子强调了《诗经》的教化功能，将其定位到个体的行为原则，并将其上升到家庭、集群和国家的层面予以阐释。如：“子谓伯鱼曰：‘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

犹正墙面而立也与?’”(8)他严格地要求弟子研习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，甚至有些夸大地认为，一个人如果不研习它们，就像睁眼瞎一样茫无所知。我们知道，二南的内容涉及到了从恋爱到结婚、从省亲到生子、再到子孙繁衍等许许多多的日常家庭生活细节，近乎包括了一个国家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所有基本因素，被孔子这样看重是可以理解的。如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、兽、草、木之名。”(8)而对于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来讲，学习《诗经》的好处往近了说可以丰富识见，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虫鱼之类的东西，可以处理好家庭事物，可以感发意志，可以抒发怨愤；往远了说可以团结民众，可以侍奉君王做个良臣，可以考知民风做个明君。事父事君，实质上就等于把《诗经》与政治等同了起来。夫子甚至认为，《诗经》是一个人把话说好的标准，达不到这一标准，不能活学活用，是没有用处的。《论语》载：

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”(8)

又载：

子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(8)

这种“达”与“专对”的话语要求，与上文论述的“赋诗见志”神奇地重合了。很明显，要使《诗经》这一先民的歌唱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，需要断章取义和有意拔高。为了达到这一教育和感化人的目的，孔夫子对《诗经》的主旨进行了有意识的解释，而这种解释显然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色彩。如：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，

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⁽⁸⁾

子夏所问的是《卫风·硕人》里的一句话的意思（“素以为绚兮”不见今本，可能是佚文），原文整章都是描写出嫁的贵族妇女的美丽容貌，意思是“美的笑容，酒涡微动；美的眼睛，黑白传神；洁白纸上，色彩绚烂”。而“素以为绚”显然是在用比，说她的美在于自然，底色好（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），怎样打扮都漂亮。可子夏问得奇怪，孔夫子答得离奇。奇就奇在这样一句赞美女子相貌的话，到了孔夫子那里竟然引申到了“绘事后素”上去，而到了子夏那里居然又引申到了先“仁”而后“礼”！孔子认为只有到了子夏这般境界，才“始可与言诗”！不难想象，执迷于孔子诗教的后儒们，为了“始可与言诗”，如何能跳得出断章取义、牵强附会的圈子，认真地读一读原作呢？可以想见，在这种氛围里解读的《诗经》，该是离题多远！而从“思无邪”，到“兴观群怨”、“事父事君”，再到“达政专对”、“始可与言诗”，这一系列主张，是否也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呢？这些认识环节，是否也要经过大脑的反复过滤才能实现呢？而在诗学成为经学的时代，这些认识自然也就成了误读大量产生的理论依据。

此后的孟子在著述中以《诗》为理论依据，引《诗》明理，基本上还是囿于“赋诗见志”的圈子做文章；而他所提出的“以意逆志”、“知人论世”两个重要命题，开启了对《诗》本义的研究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云：

咸丘蒙曰：“舜之不臣尧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诗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曰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，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：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。’故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⁽⁹⁾

就“以意逆志”来讲，也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读者的“意”能否与作者的“志”达成共识。如果不能达成共识，以他个人的意所推出的结论或解释，势必偏离作品原意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又云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”⁽⁹⁾而就“知人论世”来讲，对于